

# 收入、社会资本、健康与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实证分析

赵斌, 刘米娜

(南京理工大学 社会学系, 南京 210094)

**摘要:**文章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为基础分析城市居民的收入、社会资本、健康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稳健回归模型分析显示: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最大,尤其是相对收入的影响力最大,但健康和社会资本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控制变量中的性别、年龄、婚姻、教育和工作都对主观幸福感有影响。提高中国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发展经济增加收入的同时也要缩小社会的收入差距,构建公正的社会环境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关键词:**收入;社会资本;健康;城市居民幸福感;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487(2013)20-0096-04

## 1 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提出了民生、尊严与幸福议题,国民幸福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议题。在社会科学领域,对幸福的研究多从经济学角度探讨。边沁的功利主

义理论将幸福定义为效用,即收入不一定能增加效用但是一定不会降低效用。经济增长、国民收入等客观指标成为了衡量效用的主要指标,许多国家和地区也大多通过提高生产力和国民收入等客观指标来增进居民的幸福感。

但是,伊斯特林(Easterlin, 1974)却提出一个异于传统经济学的“幸福悖论”,认为收入增加并不一定导致快乐增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110320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NUSTYB2012XM037)

**作者简介:**赵斌(1982-),男,安徽天长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政治社会学、法律社会学。

刘米娜(1978-),女,广东河源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经济社会学。

加。他提出,尽管收入不断增加,但美国国民的平均幸福感并没有增加。随后对幸福感的诸多研究都围绕“收入—幸福之谜”展开,要么寻求进一步证实这个判断(Blanchflower & Oswald 2004),要么试图解释这一悖论,认为主观幸福感具有适应性和比较性(Luttmer, 2005),是收入预期或相对收入而不是绝对收入决定了主观幸福感,也就是说并不是收入本身,而是与他人收入的比较使自己感到是否幸福。另有一些学者认为,社会资本与个人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Björnskov (2006),提出社会资本对幸福具有影响作用仅限于在收入的作用不显著时起到一种替代作用。另外,普特南(Putnam, 2000)认为,尽管收入对幸福有影响,但收入的影响不如社会资本和健康,并且收入水平的增高其对幸福的影响边际效应在降低。关于健康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路径,学界仍存在一定的争议,其中大部分的学者倾向认同,健康是社会因素与主观幸福感的中介变量(Helliwell, 2006)。

基于欧美发达国家经验的研究结论是否适用于中国?我国居民的收入、社会资本和健康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作用如何?相对收入与绝对收入的影响作用如何?社会资本与主观幸福感存在何种联系?健康在主观幸福感中扮演着什么角色?本文在全国综合社会变迁调查(CGSS)数据的基础上,经验地讨论收入、社会资本和健康与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 2 研究设计

### 2.1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系与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合作主持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调查数据,本文采用了该调查中的城市居民样本,共6098个。

### 2.2 模型

本文主要讨论收入、社会资本和健康与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为了控制其他因素对幸福感的干扰,更准确地分析收入、健康和医疗状况对幸福感的影响,建立以下计量方程:

$$HAP_i = A \times INC_i + B \times SOC_i + C \times HEA_i + D \times IND_i + \epsilon_i$$

其中,HAP为因变量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INC是收入变量,HEA为健康变量,SOC为社会资本变量,IND为控制变量,主要是个人特征变量, $\epsilon$ 为服从标准正态分布的随机扰动项。

### 2.3 变量测量

#### 2.3.1 因变量

本文研究的因变量是主观幸福感。主观幸福感主要包含两个方面:(1)情感成分,包括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2)认知成分,即生活满意度。Inglehart等(2008)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分析基础上证明,幸福的情感因素和认知因素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成分,综合考虑两个指标能更好地衡量主观幸福感。本文利用下面的公式将快乐感和生活

满意度组成指标SWB:  $SWB = Happiness + 2Life\ satisfaction$ 。在CGSS调查问卷中,有两道问题分别涉及情感取向的快乐感测量和认知取向的生活满意度测量,分别为:(1)总的来说,您认为您现在生活中开心的部分会占到您整个生活的几成呢?(2)总体而言,您对自己所过的生活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呢?对两个指标的数值进行标准化,将Life satisfaction的权重为2。

#### 2.3.2 自变量

##### (1)收入。

影响个体主观幸福感的一个普遍关注的因素是收入。然而,最近的研究也在质疑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效用。国内研究表明,收入仍然是影响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罗楚亮,2009;王鹏,2011)。本文引入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进行分析。其中绝对收入是以调查者的年收入作为测量指标。为了符合正态分布和防止有效数据的缺失,对缺失值以平均值代替,并对对数采取了 $\ln(1+x)$ 的形式处理,其中 $x$ =个人年收入。在相对收入方面,参照组的选取一是与周边同龄群体人群的比较,二是跟个体的过去相比较。在问卷中选取了“与同龄人相比,您认为您本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和“与三年前相比,您认为您的社会经济地位”两道问题作为测量指标。

##### (2)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在广义而言指的是个体或集体通过社会关系获取资源(Putnam, 2000),尽管对社会资本的争议很大,学界对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大多包括了“结构”和“认知”两个维度。“结构”维度主要指的是“社会参与”。在CGSS的问卷中有“在业余时间,您有没有在以下方面参加由您工作单位以外的社团组织安排/进行的活动呢?”等7个问题。本文尝试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发现“宗教信仰活动”的载荷系数仅为0.153,其他指标载荷系数均在0.584以上。因此,将宗教信仰活动剔除,通过最大方差法进行主成分因子分析,按照特征值大于1标准抽取出一个公共因子,命名为“社会网络”因子。尽管“宗教信仰活动”在因子分析中被剔除,本研究中仍将其作为单独变量列出进行分析。除此之外,是否加入中国共产党属“社会参与”,也将此变量纳入。

“认知”维度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可感知的帮助”;其二是“对权威组织的信任”。“可感知的帮助”指的是发生在个体之间的横向关系的“人际信任”和“互助”。城市居民的“人际信任”在问卷中通过“在不直接涉及金钱利益的一般社会交往/接触中,您觉得下列人士中可以信任的人多不多呢?”这一问题来测量。本文采取主成份因子分析法,通过使用最大方差法对因子负荷进行正交变换后提取到了3个因子,分别命名为“熟人信任”、“社团信任”和“陌生人信任”因子。“互助”在问卷中通过两个问题来考察,分别是“您和邻居、街坊/同村其他居民互相之间的熟悉程度”和“在日常生活中,您与您的邻居、街坊/同村其他居民之间有互助行为吗?”。同样运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法通过方差极大化原则从两个项目中提取一个公共因子,称之为

“互助”因子。“对权威组织的信任”,在问卷的测量中主要考察对政府的信任。本文政府信任感由居民对于政府工作的满意程度的指标来测量,运用主成分法对测量被访者的政治信任感的9个问题进行因子分析后得到一个因子,标注为“政府信任”因子。

(3)健康。

尽管对健康的影响机制仍存在一定的争议,但不少研究指出健康也是决定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因素。健康的测量方面,大多采用物理性的健康和心理健康的结合。这里拟结合两方面的测量来评估城市居民的健康状况,具体为“总的来说,您认为您上个月的健康状况是怎样的呢?”和“在上个月内,您是否因为一些情绪问题(例如焦虑,抑郁或易怒的感受)而感到困扰呢?”两个问题,均为调查者的自评健康。

2.3.3 控制变量

根据现有文献,本研究综合考察其他研究中普遍采用的控制变量,并在数据分析时对其进行控制。性别是一个重要的人口社会学变量,在国内的幸福感研究中,性别均显示出较高的显著性(罗楚亮,2009)。对于其他重要的人口社会学变量如婚姻、教育、工作和年龄,不少研究结果均显示出显著性(Helliwell & Putnam, 2004;王鹏,2011)。另外,研究者(Kahneman and Krueger 2006)还证明了工作状况对主观幸福感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本文引入性别、年龄、婚姻、教育和工作状况作为控制变量。

3 实证分析

为了检验模型的“稳健性”,本文采用分层回归分析法。模型一主要考察控制变量对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模型二在模型一基础上加入绝对收入,测量绝对收入对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模型三在模型二基础上加入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及其变动情况从而分析相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模型四在模型三基础上加入社会资本变量,考察城市居民的社会资本对其主观幸福感产生的影响;模型五在模型四的基础之上加入健康变量,探讨加入健康作为控制变量后社会资本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变化,以探讨健康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所有模型分析用Stata9.2软件进行估计,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综合考察所有因素,收入、社会资本和健康作为自变量引入方程后,这些变量的影响显著程度和方向均没有发现明显的变化,其标准误差也较为稳定,说明我们采用的这些变量之间并没有很强的共线性问题,估计和分析结果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稳健性。

3.1 控制变量与主观幸福感

从结果来看,性别、年龄、教育和婚姻均呈现出明显的统计相关性。性别的回归系数为负表明女性比男性的主观幸福感更高,与亓寿伟(2010)等人的结论一致。这可能是由于我国现阶段男性在工作和生活上的压力更高所致。年龄与主观幸福感往往是U型曲线相关

(Blanchflower & Oswald, 2007),中年群体由于承担工作和家庭要降低了他们的幸福感。本研究同样支持这一结论。在教育变量方面,大量研究发现教育水平的提高与主观幸福有正相关关系。本研究的各个模型中教育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表明即使是控制了收入水平(包括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和健康变量的模型五中,城市居民的受教育的年限越多,主观幸福感越强,印证了主流的研究发现。另外,从本次研究结果来看,已婚的比未婚的居民幸福感要高,但是离异、丧偶的居民无论是否再婚其主观幸福感与未婚居民无显著差异。工作状况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略显复杂。在模型一、二、三中,就业人士均比失业或者下岗人士的幸福感受强,但是加入社会资本和健康变量后,显著性消失,这与现有研究结果大不一致。一些研究证实了工作是具有决定作用,但控制了收入变量后,工作的状况对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消失了(王鹏,2011)。在本研究中,即使控制了收入变量后,工作状况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还是存在的。而加入社会资本变量后,显著性才消失了,这也就意味着社会资本和工作状况对主观幸福感存在交叉效用。

3.2 收入与主观幸福感

从模型二的结果来看,绝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但在模型三中加入相对收入变量后,绝对收入对城

表1 总体样本的稳健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男性	-0.282***	-0.315***	-0.170**	-0.207***	-0.312***
年龄	-0.211***	-0.212***	-0.134***	-0.136***	-0.117***
年龄平方	0.00209***	0.00210***	0.00126***	0.00125***	0.00125***
婚姻状况					
已婚	1.131***	1.123***	0.972***	0.911***	0.939***
未再婚	-0.323	-0.359	-0.159	-0.162	0.112
再婚	0.0309	0.0441	0.116	0.161	0.364
教育年限	0.130***	0.120***	0.0693***	0.0623***	0.0457***
工作状况					
就业	0.993***	0.854***	0.228**	0.167	-0.0362
离退休	1.030***	0.885***	0.467***	0.395***	0.338***
未工作过/在学	0.935***	1.022***	0.512***	0.440***	0.388***
年收入对数		0.0950***	0.0229	0.0288	0.0315*
SES(一般)					
较低			-1.615***	-1.568***	-1.230***
较高			0.937***	0.950***	0.810***
SES变动(不变)					
下降			-1.132***	-1.082***	-0.828***
上升			0.807***	0.776***	0.721***
社会网络				-0.0675*	-0.0949***
宗教信仰活动				0.184*	0.178*
共产党员				-0.0668	-0.0616
熟人信任				0.274***	0.202***
社团信任				-0.0334	-0.0475
陌生人信任				0.0555	-0.0168
互助				0.136***	0.147***
政府信任				-0.0641*	-0.0312
健康状况					-0.323***
情绪					-0.740***
常数项	14.99***	14.41***	14.95***	15.21***	16.93***
R-squared	0.085	0.089	0.249	0.263	0.351

注:由于篇幅有限,略去标准差;\*\*\* p<0.01, \*\* p<0.05, \* p<0.1。

市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消失了。而在模型五中,加入健康变量后,绝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仍具有轻微的显著性。这意味着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社会资本及健康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影响机制。并且,当健康状况较差时,这种不幸福感影响并不能被相对收入和社会资本所消除。而反观绝对收入,无论是个人社会经济地位(SES)还是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动,对幸福感都有显著效应。当城市居民与同龄群体自我比较社会经济地位较低时,会产生强烈的不幸福感,而自我评估较高时,则会产生幸福感。同样,当调查者在跟过去三年前相比,自我感觉社会经济地位下降了,也会产生不幸福感,而感觉地位上升了,则幸福感也会增强。这表明,居民在评价自己的幸福感时不仅收入的绝对水平,更在意与同龄群体收入水平的比较以及收入水平的变化情况。从 $R^2$ 的系数来看,模型三的解释力优于模型二,模型一加入绝对收入, $R^2$ 只提高了0.004,而模型三加入两个绝对收入解释变量, $R^2$ 的系数提高了0.16,对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的解释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

### 3.3 社会资本与主观幸福感

从模型四的结果来看,加入了社会资本变量,模型的解释力提高了0.014,表明社会资本变量对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一定的影响。具体来看,无论是结构性社会资本还是认知性社会资本,都有助于提高居民幸福感。首先,参与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和组织,能增强市民的幸福。其次,参加宗教信仰活动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正面影响。再次,熟人信任因子与幸福感也存在密切的正相关关系,但其他的信任因子不具有显著性。这可能说明目前我国依然是低度信任社会,人们在遇到问题和困难时往往还是求助于家人熟人从而获得社会支持,并不信任陌生人和一般朋友。最后,政府信任因子跟幸福感存在微弱影响。但从模型五来看,政府信任因子的影响关系在控制健康变量后消失了。现有研究表明,对权威组织的信任能显著居民的主观幸福感(Helliwell & Putnam, 2004)。但本研究中,通过提高政府信任、增强社会安全感来提升整体幸福感的作用并没有得到证明。

### 3.4 健康与主观幸福感

模型五的结果表明,健康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性。可见,市民自我感觉身体状况越良好,自身的幸福感越强。同时,他感觉所受到的困扰越少,越能提高幸福感。总体来看,健康这一变量能解释主观幸福感的比例高达0.088,表明这是对主观幸福水平影响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 4 结论

通过使用CGSS数据探讨了收入、社会资本、健康对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可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相对于社会资本和健康而言,收入是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这表明,要提高我国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增加居民收入仍是最重要的途径。另外,相对收入对幸福感的贡献率非常显著,因此,除了重视增加居民收入外,还要重视社会公平,通过社会保障政策和再分配政策调节收入差距,改善居民的主观评价。其次,健康对幸福感具有很高的解释力。健康本身会对幸福感产生重要影响,但是由健康状况所引发的担忧也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原因。政府信任因子的消失,可能是由于对“医疗制度”及其他社会保障制度所引发社会不安全感减低了市民的不幸福感。因此,政府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机制,提高市民的社会安全感。第三,社会资本对幸福感的解释力不如收入和健康,但是与幸福感仍存在独立的显著相关性。因此,政府在选择公共政策提高城市居民的幸福感时,不应只注重经济以及收入增加,还要注重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提高整体的社会资本。

### 参考文献:

- [1] 元寿伟. 转型期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计量分析[D].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0.
- [2] 罗楚亮. 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来自中国城乡住户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J]. 财经研究, 2009, (11).
- [3] 王鹏. 收入差距对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分析——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 中国人口科学, 2011, (3).
- [4] 曾忠禄, 张冬梅. 澳门居民的主观幸福水平及影响因素研究[J]. 广东社会科学, 2010, (6).
- [5] Inglehart, R. Foa, R. Peterson, C., Welzel, C. Development, Freedom and Rising Happiness: a Global Perspective (1981~2007)[J].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8, 3(4).
- [6] Kahneman, D., Krueger, A. Developments in the Measurement of Subjective Well-Being[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6, (20).
- [7] Luttmer, E. Neighbors as Negatives: Relative Earnings and Well-being[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5, (120).
- [8] Putnam, R.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M].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0.

(责任编辑/浩天)